上海红颜往事

三闲 著

哈尔滨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名：上海红颜往事
作者：三闲
ISBN：7-80699-327-4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05.01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定价:20元

前 言

缠绵梦呓有时尽，青发红颜不堪老。红颜只合随风逝，往事千古知多少？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一个纷繁复杂却又繁花似锦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孕育了这样的一群女子。她们坚强、任性，追逐梦想却又不失方向。她们过着其他地方的女子所没有的小资的生活，却也经历着其他女子所没有的变革与起伏。在那样一个东方的梦巴黎，乱世红颜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远远超过了用手段谋取自己利益的政客、商人或者是黑帮的光环。当几十年过去后，这些红颜往事再度勾起我们对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群女人的追忆：胡蝶、阮玲玉、王人美、孟小冬……一长串的名字，辉照得那段纷争的岁月如此夺目耀人。

上海，在开埠以后，经过大约半个世纪，逐渐成为中国新兴城市的典型，并衍生出它特有的魅力。有幸逢此的人，是幸运的。

所以，上海女人是幸运的。

上海女人，并不完全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上海女人只是一群具备了上海性格的女人。她们被称为上海女人完全是因为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上海女人的性格。她们小资，却也吃苦耐劳；她们感情脆弱，却也性格坚强；她们出身三教九流，却也有着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她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因缘际会巧遇了彼时的上海，于是与之产生了一段传奇。这段传奇，记载的是她们与上海的种种往事。她们或长袖善舞，或多财善贾，或巧舌如簧，或奔走八方，每一个人都影射出上海的风情万种、千姿百态。

风花雪月，历来是文人骚客所钟情的内容，却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

所以，上海女人是生来的多面夏娃。

从来没有谁定义过女人天生就是水做的，可我们的思维定式却认定了这一规律。有幸的是，上海的红颜改变了这一切。她们从婚恋的失败中走出来，她们从事业的阴影中走出来，她们从迷茫的过去中走出来，她们从未知的幻想中走出来。每走一步，都带起风，随风起舞。艰辛却雅致至极，似乎她们天生就有着无与伦比的雅致之美。

所以，上海女人是雅致的。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乱世，更没有人愿意在乱世中奔波以求生存。但是，没有人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来逝去。于是，那群降生在上海的女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为这一场狂乱的世事变革作出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大是小、是好是坏。

所以，上海女人是无辜的。

再回首，面对着这么多的传奇，这么多的故事，那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在上海女人身上所留下的神秘的风采依然震撼着今天的我们。当掩卷遐思，不仅是对这样一群女子的哀叹，更多的是对她们的一种景仰。这些本该是风华绝代的女人的传奇人生和上海的舶来文化聚集在一起，辉耀出一种绝无仅有的东方美丽。

她们是作家，是艺术家，是歌星，是影星；她们是本地文化的产物，是上海文化的崇拜者，是过客；她们是创造者，也是享用者。身份、地位与所有象征个人色彩的特征一起融入到上海的血液中，这就是上海的红颜。

烟云易逝催人老，春华秋实一刻消。

在众多人的回忆里，我们做的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希冀通过这一本书可以唤起更多人对上海的回忆，也希冀可以借此怀念那些曾经辉煌的红颜人生。当我们随着这些上海红颜的往事亦悲亦喜、亦苦亦甜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就开始了另一种沉淀。

目 录

前言
不朽的传奇——张爱玲
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
绝代风流——陆小曼
寻梦录——胡蝶
乱世侠女——小凤仙
追寻生命——周璇
无冕影后——阮玲玉
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
上海情感——许广平
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
骄傲倔强的雏菊——Daisy
“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
此生苍茫——浦熙修
繁花落尽——王人美
事业女人——苏青
一代画魂——潘玉良
女掌柜——董竹君
后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朽的传奇——张爱玲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上海，凄风苦雨，处处弥漫着沦陷区的寥廓凄迷。寂寞的文坛上，她是轰轰烈烈的满山杜鹃，灼灼的大红色，既突兀又自然；她是姹紫嫣红的罂粟，颔首低垂里，带着诱惑和神秘；她是开在阴暗角落里的玫瑰，凄红而妖艳，藏不住浮世的悲欢。她的小说集叫《传奇》，而她自己也正是上海瑰丽的传奇之一。

冷暖人生

1921 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地处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她的爷爷张佩伦是晚清翰林院学士，外祖父更可谓大名鼎鼎，乃是稍微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就知道的李鸿章。可以说她是地道的贵族后裔，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

两岁的时候她随全家迁居北方，直至 8 岁才搬回上海。8 岁以后的日子对于她来说是残缺不全、黯淡凄楚的——父母失睦离婚，不久父亲再婚。因为看过太多太多关于后母的小说，她认为世上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此。“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和她想的一样，她的后母待她很不好。17 岁那年，年少的张爱玲终于受不了后母的虐待，从父亲软禁她的黑屋中逃了出来，逃到母亲那里，从此和那个封建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然而等待她的并非幻想中的幸福与美满。她的母亲是一个新式女子，颇受西方文化的熏染，几度与她的姑姑一起远赴法国留学。对于张爱玲，她的母亲一心想将她培养成一个淑女。但她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对于骤然要在窘境中学做人，而且是学做淑女，感到非常困难。因此，母女间也开始产生了隔阂。

如果说她的情感世界里还有什么轻松愉快的部分，那就只有她的姑姑张茂渊和好朋友炎樱了。她在《姑姑语录》中说：“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在《炎樱语录》中她则记录了这个黑皮肤女孩的许多有趣的奇思妙语。正是由于她们的存在，她不幸的童年里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天真，偶然也有一丝生活的甜蜜。但过往的肃杀岁月已像极热的铁烙，印在她的心间，那些稀有的甜蜜仍是不足以抹去心底深处的悲凉。幼年的诸多苦难，使张爱玲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悲欢离合，养成了坚强、孤高的秉性，也因此成就了这个瘦削女子 40 年代的一段上海传奇。

传奇文学路

家学渊博的张爱玲多才多艺，对生存的无奈与悲哀更使她如云的才气成了不可仿造的奇迹。9 岁,还在上海黄毛小学念书的时候，张爱玲的写作才华已初显端倪。她开始向报社投稿，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幅漫画，刊登在英文大英晚报。大人们让她买些本子、字典留做纪念，但任性爱美的她用 5 元钱的稿费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及至中学时代，她已是颇具成熟写作才华的女中学生了。

她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学校，国文老师是重视国教之道的教育家汪宏声。这一时期，她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一系列习作：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散文《迟暮》、《秋雨》，以及一些书评、论文，其文思、笔致、才情令人瞩目。当时，她喜欢读张恨水和张资平的小说，深受鸳鸯蝴蝶派的熏陶。14 岁那年，她写了一部长篇的纯粹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的手抄本，回目是由她父亲拟订的。这本书情节并不连贯，也没有什么寓意，是地道的游戏之作。但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功力已经是出手不凡，看不出有什么斧凿的痕迹。文字的老练、圆通远远超过了一个刚入中学的女童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人们只能称她为天才。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正如人们常说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剥夺一些就给予另一些。置身于那样的家庭，虽然令她苦闷不堪，却也使她很小就感受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体验到世态人情的冷暖，为她在文学创作上发挥自己的天才积累了许多素材。

“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她是一个天才，天才都是早熟的，从而也是痛苦的。她的聪慧让她明白，要想成名就要加倍地努力。经过刻苦的学习，1941 年，怀着“天才梦”的张爱玲终于挣脱了家庭的樊笼，考上伦敦大学（因最后受阻于战争，只进了香港大学）。大学期间系统的学习为她 23 岁的横空出世、一举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2 年，为了生存，张爱玲被迫辍学，回到了令她倍感亲切的上海，和姑姑生活在一起。

上海，这个“东方冒险家的乐园”，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十分喜欢上海，称自己“到底是上海人”。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她还说：“我为上海人写一本香港传奇……写它们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不知道是否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相克相生，上海，这个带给她所有痛苦记忆的地方也带给了她所有的辉煌与灿烂。

最初回到上海，为了谋生，她开始“卖文”。在成为中文作者之前她是一位英文作者，她用英文为《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写过不少文章，以后又都自行翻译为中文发表，这些文章构成散文集《流言》的重要篇章。而她真正的创作高峰是从 1943 年开始的。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她经亲戚介绍，拜访了刚在上海复刊的《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先生，同时毕恭毕敬地拿出了她的两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这是两个关于香港的故事，仅看题目，周先生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张爱玲告辞后就细细阅读，一边读，一边为她的世故冷漠惊叹不已。于是，文章很快就分别在《紫罗兰》的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刊登了。从此这位传奇女作家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传奇写作生涯。

随着“两炉香”的发表，她在文坛上声名鹊起。《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封锁》等陆续在《紫罗兰》、《杂志》等刊物上面世。一部《金锁记》更是使她成了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三四十年代，几乎人人都读过她的文字。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成名要早啊，来得太晚，快乐也就不那么痛快了。” 从 1943 年 5 月至 1944 年底，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她共创作发表了 1 个长篇、 6 个中篇、8 个短篇和 40 篇散文，总计 50 余万字，另外还有两部

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和《创世纪》。
这一年，她只有 23 岁，这么年轻的女孩面对众多的溢美之词，面对复杂的大上海，有些招架不住。张爱玲的师长和前辈柯灵先生以及许多左翼进步人士，劝她不要在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上乱发表作品；傅雷先生也对她的某些作品的创作倾向提出中肯的批评。可这时的张爱玲已经听不进去这些帮助和批评了。她认为要趁热打铁，“痛快地去享用，去欢快，去成功和出名”。
然而，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时，她恋爱了，而令她神魂颠倒的对象偏偏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孽世情缘

张爱玲在上海的公寓旧居，坐落在静安寺附近一个热闹的十字街头，常德路 195 号，当时被称为爱丁堡公寓。那是一幢被粉刷成粉色的大楼。这种粉色已经陈旧得有些发黑，像被遗忘了的，因为已经过期而显得发黑的粉饼。粉色的墙面上镶嵌着咖啡色的线条，使这幢大楼看上去愈发古旧。两边对称伸展出来的阳台仍然排列出一种平和的节奏感，楼前一排梧桐也长出了鲜嫩的绿叶，生机勃勃地在春风中摇曳。
这楼里的第六层就是当年胡兰成求见张爱玲的地方。他当时的身份是汪伪政府的高官、《中华日报》的主笔，但他也曾经写过许多与汪伪政府意见不合的文章，并因此受到监禁。而他的这种复杂的身份恰恰增添了张爱玲情史的传奇色彩。
1944 年初，刚获释不久、在家闲居的胡兰成，百无聊赖地躺在藤椅上看书。恰好翻到了《天地》杂志第二期上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刚看了两节，他就不觉直起身来，连连拍案叫好。而且居然细细地读完第一遍后又读第二遍，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又介绍给他的画家朋友胡金人看。在这篇八九千字的小说中张爱玲对人性的理解及其流畅的文笔，给文学修养颇高的胡兰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遣词的准确，构思的巧妙，宛若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他看着无一处不顺眼，满心都是喜欢。于是，他兴冲冲地去找苏青，从她口中得知文章的作者竟是一名女子。此后，他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同年 2 月初的一天，他第一次前往拜访张爱玲。她没有开门，因为她通常不见生人。胡兰成见敲门不应，便从门缝塞进去一张写有姓名的纸条。第二天，张爱玲很有礼貌地回访了他。她很感激他关注她的作品，他们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及至张爱玲告辞，胡兰成送她归去时，两个人已宛若多年的朋友和无话不谈的知己。胡兰成说：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张爱玲笑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是她在如花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枝花朵。她说得那么欢喜，仿佛映衬出她一生的寂寞。
从此，他们情书往来，沐浴在爱河里。胡兰成给予她的是成年男子的呵护和旗鼓相当的欣赏。他曾在《论张爱玲》中赞道：“她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和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和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辣，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一只鸽子，时时要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远远的、远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处，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
正是这种格外熨帖的赞美，让张爱玲可以在他面前更多地袒露自己，不论是幼稚还是与年龄不相称的世故。他们之间靠一见钟情建立起来的理解、信任和默契，心灵上的沟通与和谐，

是任何理智的力量和道德的说教所不能压制的。1944 年，在热恋半年后，他们终于在上海结婚。那时流行的是西式婚礼和集体婚礼，但他们却抛弃了一切仪式。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也为了享受一份恬淡的幸福，他们只有一纸婚书为两人的结合作证，而证婚人则是张爱玲的姑姑和印度籍的好友炎樱。张爱玲在婚书上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张爱玲写的是明明白白的大实话，而胡兰成的话却是蕴涵深意的。

在上海公寓里的日子是美好的。他们在这里相恋相爱，爱得如火如荼、如梦如醉，爱得伤心、伤情、不能自拔。以至后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回忆道：“牵牛织女鹊桥相会，私语未完，忽又天晓，连欢娱亦成了草草。子夜歌里有：‘一夜就郎宿，通宵语不息，黄蘗万里路，道苦真无极。’我与爱玲却是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张爱玲为了这段感情也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即使在战后胡兰成逃往温州从而结识新欢范秀美时，她仍不远千里觅他而去。当抗战节节胜利，日伪政权的末日来临时，胡兰成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找得见。”张爱玲依旧一脸信赖，沉迷地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牵你招你。”可惜，她所有的忍耐都未能挽救正在逝去的爱情。1946 年 11 月，在人民高涨的反日声讨中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回到上海，在这所公寓里住了一个晚上。当时，他们的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痕。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在张爱玲的床前向她道别。他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涕涟涟，哽咽中叫了一声“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或许她已预感到，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的确，他对她的爱情已经燃尽了。她没有能力再改变什么，她说，她将只是萎谢了。茫茫人海，修得千年万年才与他相遇，却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对爱的保留与自持，缘起缘灭，也只有她知其冷暖深浅。其实，她又怎会不明白呢？《金锁记》里的季泽，《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振保，《桂花熏阿小悲秋》的哥儿达……有的怯懦，有的薄幸，有的怯懦又兼薄幸，这些人偏偏外表看起来颇登样，可哪一个又有一点真心？对女人来说，真心都是来之不易的。张爱玲要的是婚姻的本义——不问缘由，不问经历，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阶级和信仰，世俗、坦然。她少年时代失去了太多人们通常轻易能够得到的爱，成年的她渴望的只是成熟男子的爱情。遇到胡兰成，她得到了理解和信任，滋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来。他成了她情感的栖息地，抚慰创伤的良药，因此她投入了自己，殊不知却付出了自己一生的骄傲。比起张爱玲的义无返顾，胡兰成在这段婚姻中，则左顾右盼，心中发虚。他以为她不在乎什么名分，什么婚姻，但他忘了张爱玲也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生活在滚滚红尘中心高气傲的女人。

1947 年，在得到胡兰成脱离险境的消息后，张爱玲给他写了一封信明确告诉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这番话决绝中透出些许苍凉。张爱玲开过花了，她宁可重新回到尘埃之中，也不甘当假花。曾经沧海难为水，为他，她曾经几乎哭尽了毕生的眼泪，也几乎哭尽了她那些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却始终再没写出如《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终究是一个难圆的好梦。许多年以后，胡兰成在晚年回忆起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无数美好的时光时，引用了李商隐的两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表达了他无限懊悔和感伤的情怀。一场传奇式的婚恋就这样降下了凄冷的帷幕。

“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对于人生的态度无疑是冷漠、悲观的。她的作品洋溢着她传奇的一生，繁华而苍凉的文字，一寸一寸写的都是女性的感觉：漂泊，流浪，隔离，封锁，荒凉，伤痕累累……人生的悲剧是她永恒的主题。她习惯叙说女性卑琐的命运，语气平静得叫人战栗；她了解女性的全部弱点，一一将它们折射到自己的笔下。

她说，她热爱写作如同热爱生命，只有在写作时她才感到思维的愉悦和生命的狂喜。她坦承自己是个俗人，热爱市民的俗美，编造都市男女们俗不可耐的婚恋离合，更称自己的名字为“恶俗不堪”。正是这个俗人，对于自己的文学艺术天分有着清醒的自知自觉，“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喜欢将生活艺术化。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却从不让外人窥测其内心。她的故事总是一面明亮一面灰暗，冷眼看花开花落、缘起缘灭，流逝的青春、老去的红颜，下一代一个个地被生出来，这一代一个个离去。而她永远是讲故事的人，总是那样隔着一层玻璃在其他人的故事外静静地注视着，带着一身冷淡的高傲和悲悯的温柔。如此精致的世俗自是叫人不得不喜欢。

“文如其人”这个词有些绝对，但张爱玲的篇篇作品又确如对自己人生的诠释。《传奇》就是最好的明证，它的内容令人感到十分压抑。《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一个旧式人家的小姐，她穿着旗袍，说的却是现代话，追求的是自由的空气。她与柳原的恋爱就像一场锱铢必较的角力赛：一座城市沦落了，却成全了一段原本令人叹气的婚姻。《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对金钱的欲望使她身不由己地从被虐、自虐到大肆虐待亲子，像秋风一样带着凉意的描写看得人直把生离死别都抛开。《多少恨》里的男主人公宗豫似乎并不像她笔下的那些男人那么可恶，那个天真的女主角家茵也不卑不亢——她痴情，她爱，但她自制——但这样美的事是注定要成为传说的，所以，张爱玲给了它一个凄迷的结局：情是真的，是动人的，但他来送她，她已走了。惟有屋顶那灰色的天空好像是一声凄凉的船鸣。

她是这样解释它们的:“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些作品反复而深刻表达的无非是这样的感受：人生是残酷的，人的渺小无知更映照出现实的不可抗拒性，而这些，正是我们每个人不断感受着又好像浑然不觉的。

《传奇》出版几个月后，她的散文集《流言》出版。“流言”意思是水上的文字，即流传不了多久，但同时也喜欢它像谣言一样飞快流传。这本散文集流传的速度虽然比不上谣言，但也不是水过无痕。

与她同时代的人相比，她的散文少有他们所着力经营的空灵、清丽、隽永的氛围，更多的是对世俗生活的细节描写，没有丝毫的诗意却也别样诱人，读罢总是回味无穷。胡兰成认为那是“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辣”。此后，陆续有一些以赞美为基调的文章出现，如许季木的《评张爱玲的<流言>》、柳雨生的《说张爱玲》等等，在一片赞美声中可见其文章在当时的影响之巨大。而张爱玲的反应是冷静平和的，她说，“人生安稳的一面是有永恒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人生的安稳的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她喜欢“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传奇》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苍白、瘦削、忧郁、敏感的张爱玲，而打开《流言》，一个乐观、好奇又善于制造生活情趣的张爱玲又向我们走来。如此一动一静、一乐一悲，一同构成她融古典、现代于一炉的雅俗共赏的传奇艺术世界。她亦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张迷”，包括读者和后来的小说、散文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这些模仿学习她的人不无成就，但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她。难怪李碧华叹道：“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

逝去的浮华

有人说：“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碜。”
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迁，张爱玲的处境可想而知地尴尬起来。她从没考虑过政治，但早就凭自己的直觉预言到：“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夺去了爱。”与胡兰成的婚恋使她的政治立场蒙上了一层暧昧的迷雾，文化汉奸的嫌疑让她领教了时代不容分说的性质。对于各种各样的评论，她不屑于去辩解，仍保持一种超然、矜持的态度，把指责自己的人晾在一边，不予理会。她的创作不再引起人注意，但她依然笔耕不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勤奋。
在经历了大绚烂大哀愁之后，她蕴蓄了太多难以言明的人生感慨。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 30 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 30 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 30 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30 年前上海的月亮已经沉下去了，和 30 年前璀璨美丽的传奇一起,“两个尸身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受老作家夏衍的邀请，她于 1950 年参加了上海首届文代会。她坐在会场的后排，衣着典雅，神情沉静，仿佛透出一股“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这以后，她便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又辗转到了美国，从此孑然一身，闭门生活，一待就是 30 多年，直至逝世。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个女子带着她在 17 岁写下的机智、幽默且不乏善意的自嘲，独自如流星般在天空中辉煌而过。也许真是应了那句“传奇在中国不算什么，但是都没有好下场”的俗话，张爱玲——一个 40 年代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传奇，转眼间，尘埃落定，斯人已逝。

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

在上海名人手稿馆里，那些无言的手稿流传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感动。赵清阁——一位上海女作家的名字频频出现，徐徐透露出背后的万千气象。60 余年前，她凭着一颗艺术家的良心进入文坛。她能诗能文，善小说和戏剧，更画得一手水墨国画。她伴着祖国的苦难与欢乐，沿着坎坷的道路，经历了个人与社会的动荡和转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赵清阁，笔名清谷、铁公、人一，1914 年 5 月 9 日出生在河南信阳城内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里。她的祖父是一个清朝举人，曾当过学官，熟通古文韵律，能吟诗作赋。她的舅舅是进士，母亲是一个聪明而有才气的女子，不仅长于刺绣女红，还从小就自学文化，会作诗绘画。可惜红颜薄命，在她五岁的时候，年仅 26 岁的母亲就离开了人间。幼小的她从此成了孤女，被寄养在舅舅家中，开始与表兄妹一起受旧诗书的熏陶，直到 8 岁时进入省立女师附小念书。进入小学不久，她父亲续娶了一房太太。她不喜欢继母，她的继母也不喜欢她。父亲老是站在继母那一边，开始逐渐对她疏远，只有祖母是她相依为命的亲人。由于家庭环境的恶劣，她很早就养成了伤感、孤僻的性格，习惯在“孤孤独独，凄凄凉凉”中求学，在“孤孤独独，凄凄凉凉”中求生。女师附小的教员，蒋光慈的夫人宋若瑜注意到她后，给予她极大的帮助，诱导她学习文艺创作。孤寂中，她将书本当作做知己，虽然它们无法代替母爱，却帮助她找到了逃避之所。随着“五四”运动后的新文艺的深入，叛逆的念头开始在她的心中萌生，走出这个封建家庭的渴望也愈发强烈。

这一切终于在她初中即将毕业时成为现实。有一天，她在父亲屋外的石榴树上无意中听到父亲与继母的谈话，当听到他们打算让她尽早退学嫁人时，她好似遭到了晴天霹雳，气得浑身哆嗦。她终于明白，这个封建家庭已经容不下她，他们连终身大事都要替她包办了，他们想通过这种封建婚姻，把她从家里一脚踢出去，以牺牲她来换取好处。她意识到出走是惟一的出路，她在心里疾呼：“不能容忍！我要读书，我要求学！”。

1929 年严冬里一个漆黑、寒冷的深夜，15 岁的赵清阁终于下定了决心，怀揣慈爱的祖母仅有的四块银元悄悄逃出了信阳老家，搭上了驶往开封的夜车，结束了一生中仅有的家庭生活，开始独自面对背井离乡的颠沛漂泊的生活发出的挑战。

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她居然考上了河南艺术高中，还得到助学金。离开家庭后一贫如洗的她，终于有了生活保障和较安定的学习环境。在艺术高中期间，她的主课是绘画和艺术概论，也同时学习音乐。经过两年扎扎实实的科班训练，她的西洋画、素描和国画都长进不少。她还常常随学校教务处处长谢孟刚学习乐理，并向校长焦端初借阅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她酷爱唐宋诗词及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受他们的影响，她开始写诗，用它来抒发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抨击旧社会的黑暗。1930 年，她第一次向开封《民报》投稿，稿件即被发表，那时她只有 16 岁。随后，她的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创作热情也越来越高。

此后，她一边在河南《民国日报》当编辑，一边到河南大学旁听，充实自己，同时还在救济院贫民小学校教书。在那里，她接触了许多下层人民，对他们产生深深的同情，也对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罪恶感到不平和愤慨。她朦胧地向往革命，渴望自由和平等。当时，她主编《新河南报》的文艺周刊和《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并常给《河南民报》、《新河南报》和上海《女子月刊》写“不拐弯抹角”的文章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然而她这种稚气的仗义行为触怒了报社，使她在政治上受到威胁，并被视为危险分子而遭解雇。由于局势日渐紧张，在师友的鼓励和协助下，她离开了河南，于 1933 年奔赴上海，开始了另一段人生之路。

上海人生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制造梦幻的地方。现代经济使上海空前繁华，而繁华的大上海更让许多中国女性充满了向往。赵清阁同样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读了三年艺术高中后只身来到这里。18 岁之前，因为幼失母爱，她变成一个孤僻的孩子；18 岁之后，她在上海积极投入时代的洪流，在暴风雨中成长为一株坚强的劲草。

1933 年，她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师从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倪贻德教授学习西洋画。

这时，她忧郁的气质、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更加明显。没有钱交学费，她宁愿勤工俭学也不向后母索取。生活的现实启发她思考，画笔则显露出她的思想。她在自己的小说集《凤》中自言“喜欢孤僻”，又说“喜欢寂静”。她在“寂静”中思索如何为自己杀出一条路来，于是，她的性格中又多了倨傲顽强的一面。

身为美专学生的她，却更勤于写作，逐渐成了黄心勉主编的《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还兼任上海天一电影公司出版的《明星日报》的编辑，开始其半工半读的生活。最终，她成了作家，而不是画家，她愿意关注更为复杂的社会和人生。

1934 年春，她给鲁迅先生寄诗文求教，鲁迅很快就回了信，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并亲切接待了她。在她的文学生涯中，这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给她的鼓舞力量更是永恒的。随后，由于受丁玲作品《水》的影响，她以家乡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农民逃荒的悲惨景况为背景，写下了短篇小说《旱》，连同当时她创作的其他短篇小说，由上海女子书店于 1935 年结集出版。同时，她也向摩登剧社的左明，复旦剧社的洪深、田汉等左翼剧作家学习戏剧创作。他们是“天一”的导演，常鼓励她不但要做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最好也能做导演。这对她的影响十分巨大。这期间，她还结识了欧阳予倩、应云卫、陈凝秋、袁牧之、陈波儿、安娥、王莹等许多进步电影、戏剧家，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在学校里，她参加了“美专”的学生会，继续深入下层群众中，亲身感受他们的苦难，逐渐对上海殖民地的生活有了进一步认识，为今后更好地创作打下了基础。

“美专”毕业以后，她离开上海回到开封，并受聘于母校艺术高中教书。那时正值暑假，她写了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因其中有两篇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而被判入狱半年。出狱后，她甩掉特务的盯梢再回上海，先后担任女子书店总编辑和《女子月刊》编辑，还一度在电影公司担任编剧。

虽然屡屡被特务威胁，生活在不安中，她依然不懈地为投身革命的理想而奋斗。刘以鬯先生在文章中说，她的国家观念特别强烈，有良知，愿意负起匹夫之责。抗战爆发后，她到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剧本。她相信，戏剧所起的宣传作用远比其他的表现方式更大，希望借此唤醒群众的民族意识。后来，她又去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后方重庆。虽然在深重的乌云下看不见光明，但几处灿烂的灯火却日夜照耀着她的心头。“那时在我的灵魂深处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整个中华民族为历来对日本仇恨而抑郁的心都开始奔放了！没有人不是自然而然地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为同一个‘抗敌’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人不怀着最大希望与胜利的信念。”这是 1938 年她在散文《汉川行》中的一段回忆。在重庆期间，她还曾两次见到周恩来。

1945 年 11 月，抗战胜利后不久，她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上海——这座阔别已久、千疮百孔的城市。虽然黑暗的统治使她的处境更加困难，她仍然坚持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她担任《神州卫报》副刊主编，并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直至 1979 年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红楼梦》研究及改编工作。虽然 1947 年间许多革命作家相继离去，她也一直没有离开。

佳作流芳

长期的多地奔波和曾经冷酷的监狱生活使赵清阁的身心备受折磨，她患了初期肺病，思想也消极起来，这是她生活道路中的低潮时期。然而，她并没有由于缺医少药的条件而在与病魔作斗争时沦为悲观者，她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毅力奋战，反而成为一个执拗的乐观主义者。

许广平回忆说：她学生气很浓，缄默文静，和萧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因为从小习惯寂寞与孤寂，她喜欢把自己的所有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在她还是个少女时，她就开始写作。

每当她觉得画稿无法表达出她所目睹的一切惨剧时，她就将其变为文字。她的《打浦桥》就是这样写成的。从 1933 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她写的短篇小说大都收在《旱》与《华北之秋》这两部集子里。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的烽火激起她更大的写作热情，使她找到了生命的积极意义。纵使疾病始终困扰着她，她仍然不懈地创作着。她到汉口为中国图书公司主编宣传抗日的文艺月刊——《弹花》。所谓“弹花”，就是说抗战的子弹必将盛开胜利之花。这正好圆了她亲近革命大后方的心愿。后来，武汉吃紧，为继续办好《弹花》，她不得不乘船在武汉和重庆间来回奔波。她在《汉川行》中描述了这段艰难的漂泊生活,表达了她坚持抗日宣传的决心：“我终究不忍心使之停顿，想到创办时的万般艰辛，自己遭受了种种的困难才干起来，虽然没有多大效果，可是至少出版以来，每期总有几百本轮流在加倍数目的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前方战士们手里翻阅着，使他们在火线上还能得到些后方同胞从文字上所表现的鼓励和慰劳，这对于他们是精神上的食粮，是武力的后盾，可以令他们感到安悦、兴奋，更乐于去和鬼子拼了。只凭这一点，《弹花》就有必要生存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要继续扶植她成长，我不能放弃这个责任……”

虽然发表了许多小说，但她感到自己热切的心情仍然得不到满足。她觉得只有把当时的情景完全抒写出来，用文字活生生地再现生活，才能使她得到满足。她认为小说局限了艺术形象的生动化，于是在洪深等人的鼓励下，她产生了尝试写电影文学剧本的欲望。

1936 年，她在《妇女文化》月刊上发表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1938 年 10 月，她的戏剧集《血债》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随后，她陆续写出了《汪精卫卖国求荣》、《生死恋》、《清风明月》、《关羽》、《花木兰》等 20 多个多幕剧以及三本独幕剧作品集。一时间，戏剧工作者纷纷从事救亡演出活动，话剧成了最受欢迎的战斗形式。

在她所创作的戏剧作品中，她最喜欢的是《活》（又名《雨打梨花》）。她说：“我喜欢《活》，并不敢说《活》好。《活》是一个偏于心理描画，文艺性稍重的‘温’戏。她既没有热闹的场面，又缺乏所谓‘噱头’，只是老老实实地表现了激发爱国思想与抗战情绪的主旨，而未在‘生意经’上有过分的着眼。这一点，假如你不用戏院老板的眼光看她，或许你会同我一样，也很喜欢她。”

对现实的不满促使她的写作欲望一发不可收拾。除了这些宣传爱国思想的作品，她还有不少反映反帝斗争的话剧，如五幕话剧《女杰》、四幕话剧《潇湘淑女》和根据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呼啸山庄》改编的五幕剧《此恨绵绵》。在她的笔下，每个人物都富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轰轰烈烈的悲壮气质。她还与老舍合作创作了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震》）。她认为创作这个剧本是“旨在表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精神，并提倡尊师重道，多给教育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对于合作的过程，她也感到很满意，认为达到了取长补短的效果：“我不过‘草’写而已，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她，那么她能够使你发现两样珍贵的东西：一是人类最高的感情——天伦的、师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

尽管创作了许多作品，但文学上的成绩，并没有使她满足，她依然不断地创造着、前进着。她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如果我的病不再折磨我，我的生命还能延续下去的话，我倒愿意矢志终生献身文艺，永远学习，永远努力……”虽然病魔一直在威胁着她，甚至有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却仍然活得十分有劲，视文艺为最终目的。在这个时期，她还不断探索，创作了不少戏剧理论著作，如《抗战戏剧概论》、《抗战文艺概论》、《编剧方法论》等，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抗战胜利后，她出版了独幕剧集《桥》、短篇小说集《落叶》，创作了中篇小说《江上烟》、《艺灵魂》，长篇小说《双宿双飞》、《月上柳梢》，以及许多杂文、散文。回到上海，她蛰居

虹口，闭门谢客，但一直写作，从不辍笔。《几番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是她从事电影创作的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蝶恋花》成了当时很卖座的电影，因为它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的妓女行业的状况。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真实、黑暗而又很少被人注视的角落。随后，她创作了《女儿春》、《自由天地》等剧本。打倒“四人帮”后，她又创作了《粉墨青青》，在《人民日报》、《读书》、《战地》等报刊发表了许多诗歌和散文，可谓是一位“多产”的作家。

诤友情怀

赵清阁一直独身，她和女佣吴嫂相依为命，常有文章见报，但拒绝为自己写传。即便如此，她的一生也不孤寂，她有幸结识了诸多的师友，并得到他们的友谊和关爱。

她早年最景仰的是郭沫若，在中学时代就拜读过郭沫若的《女神》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译著。在上海的时候，因为钦羡、向往革命的大后方，她向郭沫若表达了投身革命的意愿。郭沫若在回信中问她：“我们这里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她回答道：“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1937 年抗战爆发后她果真去了。她到武汉慰问苏联志愿军空军大队，还到重庆聆听郭沫若宣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演讲——《女子是人类的一半》，并将其整理成文，发表在由她主编的《弹花》月刊上。她在给郭沫若写信时尊称其为“沫翁”。郭沫若回信时，署名为“羽公”，他幽默地对她解释说：“你称我为翁，我还没有老呢。‘羽公’，就是‘翁’字上下结构的位置对调。你看我这个老翁还能在你面前翻个跟斗，你看我老不老？”后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概括了她的性格、气质和她在文艺上的贡献。

她与茅盾的友情维系的时间最长，也是最深的。他们相识于 1937 年，那时作为编辑的她常向茅盾约稿。虽然全国解放后，他们各居京沪，但笺问始终未断。只有文革时有一段时间彼此失去联系，直到 1975 年暮春，病中的她向友人打听茅盾的近况后，才略知一二。她还冒险给茅盾写了封信，简述近况以报平安，信后她抄录了一首《西湖忆旧》：“黄昏品茗西泠前，酒酣明月夜泛船；洪老求签卜解放，茅公知津笑书癫。”以此来询问“第二次解放”的到来。当时年已八旬的茅盾对她很是赞赏，写了长律《清谷行》赠她，后被收入到《茅盾诗词》中。长年历经劫难使她的胆子越来越小。1976 年茅盾 80 岁生日时，她为他精心绘制了一幅山水小轴《秋江孤帆图》，即将寄出时又觉题句欠妥，怕招惹祸端，于是只留上下款。茅盾看后回信说：“秋江孤帆图，甚有飘逸之意致，鄙意原题倘若裁去，则于全布局有损，当珍藏之，不以示人也。”她这才作罢。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即书写《粉碎反党集团四人帮》和《过河卒》两首诗给她，以庆贺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雅舍主人梁实秋与她也私交甚笃，还有过愉快的合作。1943 年，她为梁实秋翻译的英国女作家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所感动，将其译作收入她主编的《黄河文艺丛书》并出版。后来，她又与梁实秋相互切磋，将其改编为话剧《此恨绵绵》。此剧后来由当时的重庆国立歌剧学校演出，并获得好评。日本投降后，他们南北分手，各居旧地。1986 年在哈尔滨的“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上，她邂逅华裔美籍教授周策纵时，还曾探询梁实秋近况并托言问候。

战时在重庆，她和老舍同在文协工作，她十分佩服老舍的才华，仰慕之情常溢于言表。她藏有老舍大量的手札，晚年她把书画捐给了国家，家里挂的都是复制品，惟一留下的真迹是老舍的对联：“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边上的小字是“清阁长寿”，落款为“老舍恭祝”。它被挂在她书案前方的墙上，与她朝夕相处。

抗战后期，由于改编《红楼梦》的成功，她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最佳女作家，她说这和冰心对她的鼓励是分不开的，后来她和冰心还常就健康问题多次通信。

晚年时她自制了一本精美的画册，收藏的多是自己的画作。每幅画旁分别有郭沫若、冰心、张恨水等人的题词。她和许多文化界人都有文字来往，这些文稿谈诗论画，纵论时事，才情横溢，十分珍贵，后来被她赠与上海图书馆。

战后岁月

田汉曾写过一首七律：“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岂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甘。敢向嘉陵录画料，弹花如雨大河南。”认识这位多产的女作家的人，都说她“冷”，有男子气概。其实并不尽然。有男子气概不错，但她并不是个缺乏热情的作家。没有热情的人写不出扣人心弦的作品，她只不过更愿意将热情注在作品里，而非将它当做面具戴在脸上。

1945 后，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她不仅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及上海戏剧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还担任上海文联委员。在两三年内，她创作了许多部电影剧本，有《女儿春》、《自由天地》等。她还先后把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以通俗文字写成小说和剧本，如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本《桃花扇》、五幕话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等，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得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学遗产。

上个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千万知识分子深受其害，她当然也不能幸免。她被批斗抄家，过度的精神迫害使她患了脑血栓，瘫痪了几年，她后来回忆说：“真是九死一生！”。

打倒“四人帮”后，她获得平反，创作的热情又重新被激发起来。她挥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粉墨青青》，生动地表现出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遭遇，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散文。20 世纪 80 年代，她出版了散文集《沧海泛忆》、《行云散记》、《浮生若梦》、《往事如烟》及《红楼梦话剧集》等。1990 年以后，她虽然没有什么大作品问世，却也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老病不堪，脑子还好，笔耕不辍，写写小文，日惟三五百字耳。”

“直以见性，柔以见情。”作为作家、剧作家的赵清阁，伴着多变的风云，颠沛流离在中国文坛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以她独特的艺术表现，向人民展示了独特的历史画面，写下了丰富多彩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中国新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绝代风流——陆小曼

她是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火树银花的女子，亦是一个被千夫所指的女子。

她的前半生，是一只美艳的蝶，肆意炫耀着自己光彩照人的外表。她的后半生，是一只平凡的蝶，安宁，平静。

徐志摩说：“一双眼睛也在说话，睛光里漾起心泉的秘密。”胡适说：“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小观音

陆小曼名眉，别名小眉、小龙，笔名冷香人、蛮姑，1903 年 9 月出生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据说这天恰巧是传说中观音菩萨的生日，而她恰又生得眉清目秀，肌白肤嫩，于是家里人又戏称她为“小观音”。

她的父亲陆定，不仅是晚清举人，而且还留学日本，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在留学期间他还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并因此曾在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被下令通缉。后被曹汝霖等营救，又在类似财政部的地方供职 20 多年，先后任过参事、司长等职，还创办了中华储蓄银行。她的母亲吴曼华出生于官宦世家，是当时少有的知书识理的妇女，她不仅文学功底深厚，而且还善画工笔画。他们先后共生育九个儿女，都不幸夭折或在中年时死去，只有排行第五的陆小曼幸存下来，因此对她宠爱有加，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因为生长在官僚家庭，父母望女成凤，家教极其严厉，陆小曼可以说是当时真正的大家闺秀，优厚的家庭条件使她受到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

她幼时在上海上幼稚园，两岁随父母迁居北京，6 岁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13 岁转入法国人办的贵族学校北京圣心学堂学习法文、舞蹈、绘画、钢琴、礼仪等。其父还聘请英籍女教师在家中为她补习英文。她自小聪颖过人，在未踏出国门一步的情况下，十五六岁时，已精通英、法两国文字，英文论文、信札已能意到笔随，17 岁时出落得亭亭玉立，仪态万方，能歌善舞，长于油画，同时还兼擅京昆两种唱腔，是当时交际场上一个聪明、漂亮、活泼、可爱的女子。顾维钧曾当着她父亲的面表扬她说：“陆建三（陆定）的面孔一点也不聪明，可是他女儿陆小曼小姐却那样漂亮、聪明。”她父亲听后，既啼笑皆非，又非常得意。

可惜，才貌双全的她，虽然有锦衣玉食，却偏偏和病魔纠缠在一起，一生中饱尝病痛的折磨。苍白、病弱、常昏厥，她似乎暗合了西施捧心的中国式病态美学。病体让她对自己一筹莫展，也让她身边的人对她一筹莫展。徐志摩在《眉轩琐语》中多次提到：“曼昨晚又发跳病痒病，口说大脸四大金刚来也！真是孩子！”“曼的身体最叫我愁，一天 24 小时，她没有小半天舒服，我没有小半天完全定心。”她的表妹吴锦也曾回忆说：“陆小曼所受的病痛是常人无法想像的，从 20 岁到 60 岁，她每次大便都相当困难。在徐志摩死后，我和陆小曼生活在一起，就由我帮她用香油灌肠才得以排便。当时香油很紧缺，为了少排便，少麻烦，她尽量节制饮食，其中的苦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的。”因为病，她不能用功做事业；因为病，她不能去国外发展；因为病，她逐渐学会了吸食鸦片——留洋归国时还抓了一艘贩毒走私船的徐志摩虽然对此稍有不满，也还是理解着，忍耐着。

正所谓红颜薄命，一代才女陆小曼的人生似乎也如伴她一生的病痛般苦不堪言。

北陆才女

艳丽的容貌、富有的家世、出众的才情使陆小曼早在北京社交界就有了“南唐（唐瑛）北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